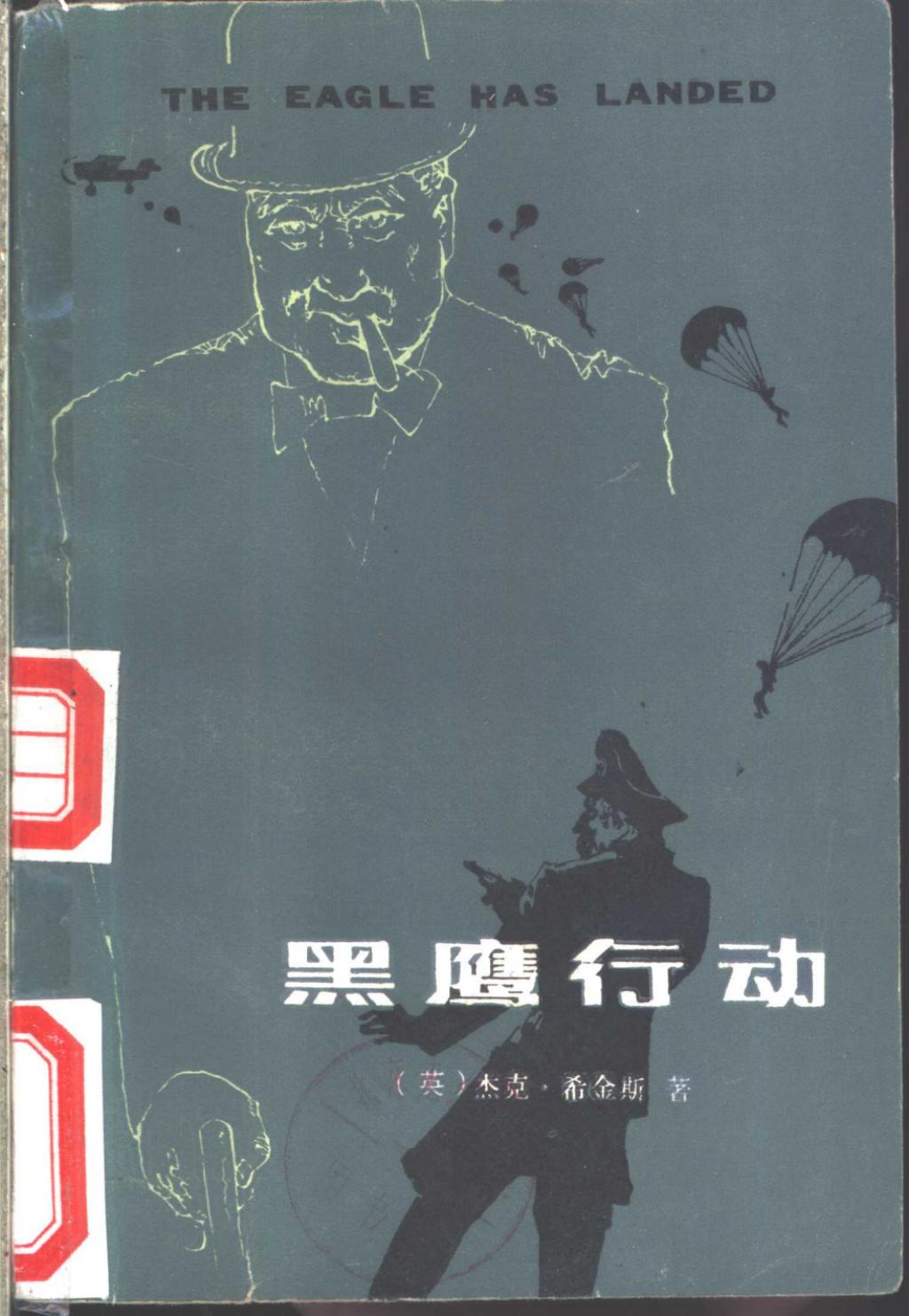


THE EAGLE HAS LANDED



黑鹰行动

(英)杰克·希金斯 著

黑 鹰 行 动

〔英〕杰克·希金斯

陈建平译

Jack Higgins

The Eagle Has Landed

据美国Bantam公司1976年5月第二版译出

黑 鹰 行 动

〔英〕杰克·希金斯

陈 建 平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盐城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3 字数290,000

1984年10月第1版 1984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500 册

书号：10100·553 定价：1.25元

责任编辑 尹礼荣

译 者 的 话

英国作家杰克·希金斯(真名叫哈里·帕特森)生于一九三五年。他成为专业作家前,是英国里兹大学的高级讲师。

希金斯年轻时在英军服役期间,曾经耳闻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军突击队企图在英国诺福克绑架丘吉尔未逞的事。事隔几年,希金斯到诺福克度假。他惊异地发现,诺福克依然是乡村气息浓重的农村,居民对旅游者出现在他们身边感到惊异,甚至怀疑。他还了解到,诺福克部分地区在战争中曾列为“禁区”,专供反法西斯阵营的波兰人、捷克人、或其他外国军人作为作战训练的场地。离海岸一英里,是所谓“鱼雷艇航道”。那里时有德国海军的鱼雷艇出没,袭击英国的沿岸船只。大战中,北诺福克还用作英国皇家空军和美国空军轰炸机中队的中间停留基地。

《黑鹰行动》就是根据这些背景写成的。故事说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希特勒为了挽救败局、振奋士气、争得一席和谈之地,下令绑架丘吉尔。党卫军首脑希姆莱责成军事情报局的拉德尔上校,具体地策划和组织了整个行动。正在服刑的以施泰纳上校为首的十余名德军伞兵,被空投到北诺福克海滨的斯塔德利村等待时机,但由于抢救落水儿童而暴露了身份,走漏了消息,引起与驻防在附近的美军别动队的一场激烈战斗。德军伞兵把以谢夫特上校为首的美军别动队打得伤亡惨重,但终因寡不敌众而彻底失败。施泰纳只身一人潜入梅尔塞唔庄园,在对丘吉尔举枪瞄准之际被当场打死。

故事中还穿插了英国姑娘莫莉与特务德夫林的一段短暂而浪漫的爱情。

据作者自己说，他的这部小说一半是史实，另一半则是虚构的。小说问世后很受读者的欢迎，成为一部畅销书，很快在英美等十二个国家出版，不久又拍成同名影片。这部书发表于一九七五年，距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有三十年。在欧美，有些人对战事已经逐渐淡忘；战后成长的青年对战争更感到陌生，但也有些人心中还存有二次大战的阴影。于是一些作家为了不同的目的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回顾和分析。所以，七十年代在欧美出版战争题材的作品比较多，而本书却以它新颖的题材和独特的风格，深深地吸引了读者。

作者在书中揭露了希特勒、希姆莱等纳粹头目和盖世太保的阴险毒辣和凶残成性，然而，也以赞赏的笔调，歌颂了以施泰纳为首的十余名德军伞兵，美化他们如何不畏艰险，英勇无畏，舍己救人；甚至宣扬不分敌我的恋爱情观。这些，希望读者有批判地阅读。

一九八一年十月

序一 幕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六日星期六凌晨一时，第三帝国党卫队首领、国家警察首脑海因里希·希姆莱收到一封言简意赅的电报：“雄鹰已经降落。”这封电报说的是一小股德军伞兵那时已安全抵达英国，已准备好在诺福克的一所乡间别墅绑架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先生。丘吉尔恰恰正悠闲地在海边的这所别墅里度周末。本书意在再现围绕这一令人惊叹的奇迹而产生的种种事件。本书描绘的故事至少有百分之五十是见诸史籍有根有据的，余下的哪些属于猜测和虚构，则请读者自己判断。

第一章

我穿过停柩门进入教堂的墓地，看到有人正在墓地的一角挖掘墓穴。这个情景至今记忆犹新，因为本书叙述的故事几乎都是以此为背景展开的。

那是一个风雨交加的早晨。我翻起军用雨衣的领子挡雨，穿越一个个墓碑走向墓穴，这时从教堂西首的山毛榉树丛里忽地飞起了五六只乌鸦，就象一团团黑色破布，一面飞一面呱呱地对叫。

我看见在墓穴深处挖土的人，只听见他低声地自言自语，不过听不清说些什么。新翻上来的土堆成一堆，我走上前去，站在土堆旁边，避开了掘墓人用力甩上来的一铲土，探头往下看。“雨天早晨干这活真够受的。”

他抬起头来，靠在铲子上。他是个很老的老头子，头戴一顶布帽，穿一身满是泥巴的破烂衣服，肩上披着一个麻袋。老头双颊深陷，满脸灰色短髭，眼睛湿涩，目光呆滞。

我又试着跟他搭话。我说：“下雨。”

老头好象有点领会我的意思了。他抬起头来扫视了一下阴沉的天空，摸摸下巴，“我看，天放晴以前还要变得更坏哩。”

我说：“这样的天气可不好干活呀。”墓穴底部的积水至少有六英寸深。

老头把铲子往对面的墓壁上一捅，墓壁就象朽木一样裂开了，泥土也唰唰地落了下来。“算不上太糟。在这小小的墓地里，年复一年地埋葬了无数死人，现在新死的人不是埋在泥土

里，而是埋在前人的腐尸朽骨堆里。”

说着老头笑了，露出掉了牙的牙床。然后，他在脚下泥土里扒着，捡出一节手指骨举起来给我看，“你懂我的意思了吧？”

千变万化的生活吸引着作家的兴趣，但是即使是职业作家偶尔也会对生活的某些方面，扭头不看。我决定还是办我的事。“这是一个天主教堂吧？”

“这里下葬的都是罗马天主教徒，”老头说。“自古以来的老规矩。”

“那你能帮忙罗。我要在这座教堂里找一个墓。也可能是—块纪念碑。盖斯科因——查尔斯·盖斯科因。他是一位船长。”

“从来没听说过，”老头说。“我在这里当教堂司事已经四十一年了。他什么时候下葬的？”

“大约在一六八五年。”

老头听了完全无动于衷，脸上的表情依然如故。他平静地说：“这么说来，是我来这里以前下葬的，这你也明白。问问维里克神父——他也许知道。”

“神父在教堂吗？”

“可能在教堂，可能在家里。家在院墙后面树林的另一边。”

这时不知为什么我们头顶上方的山毛榉树高处一群乌鸦突然活跃起来了，好几十只在雨中盘旋，空中响彻鸟群的喧叫声。老头抬起头往天空望望，并把那节手指骨使劲向树林里扔去。接着他开口说了一句令人费解的话。

“吵死了，该死的！”他喊道：“滚回列宁格勒去。”

那时我已经转过身去想要离开了，但一听这话我又停住了脚步，心中感到十分迷惑。“列宁格勒？”我说。“为什么说列

宁格勒？”

“这些鸟是从列宁格勒飞来的。欧椋鸟也是打那儿来的。这些鸟儿在列宁格勒戴上脚圈，到了十月份就迁徙到这里来了。那里的冬天冷得鸟受不了。”

“真有这样的事？”我说道。

老头说得兴致来了，他把夹在耳后的半截卷烟拿下来往嘴里一塞。“冷得真够呛。大战期间在列宁格勒死了许多德国兵，他们不是打死的，是活活冻死的。”

我听老头说得入了迷。我说：“你打哪儿听来的？”

“这些鸟的事吗？”他说道，转瞬之间他的神情又变了，一下子露出一脸狡黠的表情。“噢，维尔纳告诉我的。他对鸟儿无所不知。”

“维尔纳是谁呀？”

“维尔纳？”老头眨眨眼睛，脸上又露出了一副迷惘无知的表情，不过这种表情是真是假当时无从分辨。“他可是个好小伙子。维尔纳，好小伙子。他们不该那样对待他。”

老头弯下腰重新挖土，完全把我撇在一边了。我又站了片刻，可是他显然不想再跟我谈话了。他说的很动听，但是尽管我很想听他说下去，我却不得不转身穿过一块块的墓碑向墓地入口处走去。

我走到教堂门廊停住了脚步。墙上一块深色木质布告牌映入了我的眼帘。布告牌上的烫金字年长日久失去了光泽。牌子顶部写着：斯塔德利村，圣玛利教堂，下面注明了作弥撒和作忏悔的时间。底部写着：耶稣会神父菲利普·维里克。

教堂大门是橡木做的，已经年深月久，门上扎着一道道铁箍，还布满了对穿螺钉。门的把手是一个狮子头，狮子嘴里衔着一只大环，要把铜环转向一边才能把门打开，门打开时会轻

轻地发出一种令人心寒的嘎吱声。

我原先以为教堂里一定光线不足，阴森可怕，而事实上我发现自已置身于一座小巧的中世纪天主教堂之中，教堂内光线明亮，异常宽畅。中殿连拱廊气象非凡，巨大的诺曼底式的主柱高耸直插雕绘着各种人象和飞禽走兽的雄伟屋顶，这些浮雕绘画无不精致典雅、一一保存完好。刚才令我惊讶的光线，大部分是从正堂两侧两排高齐屋顶的圆形侧窗射进来的。

教堂里有一精美的石质圣水器，它旁边的墙上有一块上了油漆的木牌，上面写着历来在此教堂担任圣职的神父的姓名。首任是一一三二年间到任的叫拉费·德库塞的神父。最后一名是一九四三年接任的维里克神父。

在这对面是一间小巧昏暗的小礼拜堂，圣母玛利亚神像面前烛光摇曳。在这半明半暗的气氛里圣母像好象是飘浮在半空。我举步走过小礼拜堂，沿中央过道走过一排排做弥撒用的靠背长凳。这时教堂里十分幽静，只有长明灯发出的红宝石般亮光，祭坛上高悬着的一具十五世纪基督受难十字架以及雨点敲打高耸的窗户的声音。

我身后传来了双脚踏在石板地面上发出的脚步声，一个干枯而坚定的嗓音说道：“我能为你效劳吗？”

我一转身看见一位神父站在圣母堂的入口处，他高高的个子，面容瘦削而憔悴，身穿一件褪色的教士长袍。他铁灰色的头发剪得很短，双眼深陷在眼眶里好象久病初愈，面颊上绷紧的皮肤更加深了我的这个印象。这是一张奇特的面庞。这位神父既象一位军人，又象一位学者，可是一想到我从布告牌上看到的，他是一位耶稣会教士，我就感到不足为奇了。如果说我还有识人的能力的话，那么，他的面容表明，他是一位与痛苦为伴的人。当神父跨步上前时，我还看到他拖着左脚费劲地

倚在黑刺李手杖上。

“您是维里克神父吗？”

“是的。”

“我刚才跟外面一位老人说话，他是教堂司事。”

“呀，是的，那是莱克·阿姆斯比。”

“我原来不知道他的姓名。他认为你或许能帮我一点忙。”
我伸出了手，“我叫希金斯。杰克·希金斯。我是个作家。”

神父踌躇了一下才伸出手来跟我握手，不过这只是因为他要把手杖从右手递到左手。即使如此，他的神态还是有所保留，至少在我看来是如此。“我怎么能为你做什么呢，希金斯先生？”

“我正在为一家美国杂志写几篇文章，”我说道。“历史题材。昨天我到克莱的圣玛格丽特教堂去过。”

“一座美丽的教堂。”说着神父就在近身的一张长凳上坐了下来。“请原谅，这些日子我很容易疲劳。”

“那里的教堂墓地有一个平墓，”我继续说道。“你可能知道，谨献给詹姆斯·格里夫……”

神父听了立即接下去说道，“……一六七六年一月十四日协助克劳德斯利·肖维尔爵士在巴巴里的特里波利港焚毁敌船。”说完他第一次露出了微笑，“不过在这一带，这是远近著名的碑文。”

“根据我的研究，当格里夫任‘橘树号’船长时，他手下有一名大副叫查尔斯·盖斯科因，此人后来成了海军舰长。一六八三年，查尔斯·盖斯科因因老伤复发去世，死后好象是由格里夫把他的遗体运到克莱安葬。”

“我懂了。”神父有礼貌地说，但话音里流露出他对此没有特别的兴趣。实际上他的话音里倒表露了他有点不耐烦了。

“克莱的教堂墓地里找不到任何踪迹，”我说。“教区纪录中也没有记载，我还到维夫通、格兰特福特和布兰肯尼教堂去找过，都一无所获。”

“所以你认为他可能在这里？”

“我又查阅了一遍笔记，记起他自幼信奉天主教，在我看来，可能是按照他自己的宗教信仰安葬在天主教徒的墓地里了。我住布莱肯尼旅馆，与一位酒吧招待谈起时，他告诉我斯塔德利村有一座天主教堂。这里显然是个偏僻的小地方，我足足花了一个小时才找到这里。”

“恐怕又要使你失望了，”说着神父起身站了起来。“到目前为止，我在圣玛利教堂任职已经二十八年了，我可以保证我从没听人提起过查尔斯·盖斯科因。”

这可是我寻觅这位船长墓地的最后一个机会了，我无意之中流露出失望的神情，尽管如此，我还是坚持追问下去，“你有十二分的把握吗？这一时期的教堂记录会不会提供点线索？可能在教区出生和死亡记录簿上会有记载吧。”

“我恰好对地方志有兴趣，”神父冷冰冰地说道。“与本教堂有关的一切文件我无不熟悉。我可以向你担保，文件中决计没有提起过查尔斯·盖斯科因。如果你能原谅我，我要告辞去用午饭了。”

神父向前迈步时，不料手杖一滑，绊了一下，差点摔倒。我急忙扶住他的臂肘，但又在他左脚上踩了一下。他没有表示出疼痛的样子，连眼睛都没眨一下。

我连忙说：“我真抱歉，太鲁莽了。”

神父脸上第二次露出了微笑。“碰巧没有踩着骨肉，一点也不痛。”他用手杖敲打自己的左脚说：“这条腿真讨厌极了，不过象人们所说的，我已经学会对付着跟它过日子了。”

他说的这种话，既无需旁人回答——神父也显然不指望我回答——于是我们便一起沿过道走去，神父的脚行走不便，所以我们走得很慢，我说道：“这教堂真美。”

“是呀，我们为这座教堂深感自豪。”神父给我开了门说：“抱歉，不能进一步相助。”

“那不要紧，”我说。“趁我在这里，我到墓地去走走，你不会介意吧，神父？”

“看来很难说服你。”神父说这话没带一点恶意，“为什么不可以去看看呢？有不少很有意思的墓碑。我特别向你推荐墓地西侧的碑石。都是些十八世纪的墓碑，与克莱教堂墓地的碑石都出自一位本地石匠之手。”

这次神父倒先向我伸过手来。我握住他的手，他说道：“你知道吗，你的姓名好象耳熟。你去年写过一部关于北爱尔兰骚乱的书，是吧？”

“是的，”我说。“糟透了。”

“打仗总是糟透了，希金斯先生。”神父的脸色变得苍白起来。“人是残忍的，打起仗来更是不择手段。再见。”

神父关上了教堂大门。我走进了门廊，心想这真是一场奇特的巧遇。我点上一支烟冒雨举步走去。教堂司事已经走开了，眼下墓地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当然还有不少乌鸦。列宁格勒飞来的白嘴鸦。我又重新思索起这个话题来了，接着我不得不坚定地把这个念头从脑海里驱赶掉。我有事情要干。我跟维里克神父的一席话并没有增加我找到查尔斯·盖斯科因的墓葬的希望，可是除此以外，我再也没有地方可找了。

我从墓地西首开始按部就班地一一细细看过来，特别留意神父提到的墓石。这些墓石确实非常古怪，上面粗雕细镂着各种饰物：骷髅、带翼的沙漏和天使长等，形象生动，工艺古

朴。很有意思，但都不是盖斯科因的年代。

我花了一小时二十分钟把墓地仔细查看了一遍以后，只得认输了。这座墓地有别于大多数乡间墓地，修缮得有条不紊。花草树木都修剪得当，什么都一目了然，没有被荒草野树挡住看不见东西。

好了，查尔斯·盖斯科因的墓葬是找不到了。我最后认输时正巧站在老头新掘的墓穴边上。为了防雨，教堂司事在墓穴上盖了一块防雨布，雨布的一角已经掉进了墓穴。我蹲下身去把防雨布拉回原处，当我站立起来时却惊奇地发现一样东西。

离我一两码以外，紧靠教堂钟楼的墙跟下，在一个长满绿草的小土墩上，嵌着一块平置的墓碑。这是我已经提到过的十八世纪初期的墓碑，本地石匠的杰作。墓碑上方刻着头盖骨和交叉的骨骼，抬头写明是奉献给一个名叫杰里迈亚·富勒的羊毛商、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我蹲在地下，便看到这块碑石之下还另有一块石板。

我身上的凯尔特人气质一下就占了上风，感到一阵盲目的兴奋，好象预感到再往下发掘就会发现什么似的。我弯下身子想用手指挪动它，可是没那么容易。不过，突然之间，碑石竟被我挪开了。

“盖斯科因，出来，”我轻声地说道。“你就出来吧。”

碑石滑向一边，斜靠在土墩坡上，下面的东西一览无遗了。我可以说这是我一生中最感到惊奇的时刻。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一块简朴的墓石，上首刻着一个德国式十字——许多人都把这种十字说成是德国铁十字。十字底下的碑文是用德文镌刻：“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六日战死的库特·施泰纳中校和十三名德军伞兵安葬于此。”

我的德语近年来荒疏了，水平最多不过平平，不过当年读读这样的碑文还能对付。碑文上分明是那样写着的。

我在雨中蹲着身子，仔细复核是否译错了。没错，一点也没错。可是这怎么可能呢？首先，我知道英国斯坦福郡坎诺克德军军人公墓于一九六七年揭幕，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死英伦的四千九百二十五名德军的遗骸全部迁葬于该军人公墓，我还以此为题写过文章呢。

碑文上明白写着“战死”。不，简直是荒谬绝伦。显然是谁搞的骗局。必定是个骗局。

还没等我进一步思索下去，我的思路就被一阵愤怒的喊声打断了。“你到底想干什么？”

维里克神父在雨中打着一柄大黑伞，一拐一拐地穿过墓石朝我走来。

我兴致勃勃地大声说道：“神父，你会发现这事非常有趣。我有一项惊人的新发现。”

神父走近我身边时，我意识到事情不妙。情况非常紧张，神父的脸色由于激怒而苍白如纸，周身颤抖。“你竟敢移动这块碑石？亵渎圣物——我只能用这个词来形容你的行为。”

“好吧，”我说。“我为此深感抱歉，不过请看我发现了什么？”

“我不管你发现了什么，立即给我把墓石放回原处。”

这时我开始感到有点恼火了。“别傻了。你不知道墓碑上写的是什么吗？如果你不懂德文，请允许我讲给你听：‘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六日战死的库特·施泰纳中校和十三名德军伞兵安葬于此。’你现在还不觉得这有多么吸引人？”

“不怎么吸引人！”

“你的意思是你以前看见过。”

“不，当然没有见过。”神父现在好象被人紧追不放似的，然后他的话音里流露出绝望的口气又加了一句：“你现在把石板放回原处好吗？”

我一点也不相信他的表白，我说道：“这个叫施泰纳的人是谁？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告诉过你了，我什么也不知道，”神父说道，他看上去更加难堪了。

这时我想起了一件事。“一九四三年你不是在这里吗？你是在这个时候接过教区圣职的。这都是写在教堂墙上的木牌上的。”

神父听了勃然大怒。“我最后再说一遍，请你把石板放回原处好吗？”

“不，”我说。“我无法遵命。”

令人费解的是，这节骨眼上神父好象恢复了自制力。“好吧，”他镇定地说道。“那末我就请你立即离开这里。”

考虑到神父的态度，我再与他争辩也没意思，所以我便简洁地说道：“好吧，神父，如果你希望我立即离开，我只得告辞了。”

我迈步踏上了小路，这时神父喊道：“再别回来了。如果你再回来，我就会毫不犹豫地把警察喊来。”

我穿过教堂墓地的停柩门，坐进小汽车，驾车走了。神父的威胁倒吓不住我。我激动得根本没把他放在心上，我实在太好奇了。斯塔德利村的一草一木都引人入胜。斯塔德利似乎是一个这样的地方：它只会出现在北诺福克，而不会出现在别处。你今天碰巧看见了，明天再找就找不到了。于是你就怀疑，你原先是否真的到过这个地方。

倒不是说这个村子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村里不过一座

教堂，围墙里的神父住宅，分散在溪边的十五六所各种样式的房舍，装有大水轮的古老磨坊，公共草地对面名叫斯塔德利·阿姆斯的乡村旅店。

我把汽车停在溪边的路旁，点上一支烟静静地回想刚才的遭遇。维里克神父是在撒谎，我可以肯定他见过那块墓碑，也一定深知其中含义。说起来叫人啼笑皆非。我为了寻找查尔斯·盖斯科因的墓葬偶然来到了斯塔德利，想找的没有找到，却有更吸引人的发现，一宗地地道道的神秘事件。现在的问题是我应该怎么办？

答案得来全不费工夫，这时教堂司事莱克·阿姆斯比正好从两座房舍间的狭弄里走出来。他仍是一身泥水，肩上还披着那张麻袋。他穿过马路进了乡村旅店斯塔德利·阿姆斯，我立即跨出汽车跟着他也进了旅店。

旅店门口的牌子写着旅店的持执照人叫乔治·怀尔德。我打开门进了走廊，地面是石板铺的，墙是木板镶嵌的。通向左边的门半开半闭，里面传出低低的说话声和一阵笑声。

旅店里没有酒吧间，不过有一个很舒适的大房间，房里有一个石砌的大壁炉，几张高靠背长凳以及几张木头桌子。房间里已经有六七个顾客在喝酒了，他们年纪都不轻。我看平均有六十岁光景——这些日子这类乡村地区都是这种令人沮丧的情景。

他们是地地道道的乡下人，饱经风霜的脸，头戴粗花呢帽子，脚穿高统橡皮套鞋。三位顾客在玩多米诺骨牌，边上站着两个看客，一个老年顾客在火炉边怡然自得地吹口琴。我走进去时，他们都抬起头来上下打量我，表现出一种审慎的兴趣，生活在紧密的小圈子里的人常常是这样的。

“下午好，”我说。